



闲话三分

陈迩冬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

闲话三分

陈迩冬 著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话三分 / 陈述冬著. —北京: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3.9

(中学图书馆文库)

ISBN 978-7-108-04558-4

I. ①闲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5060号

责任编辑 韩冰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徐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)

经销 新华书店

网址 www.sdxjpc.com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13年9月北京第1版

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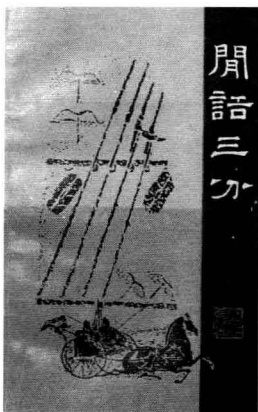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75

字数 99千字

印数 0,001—5,000册

定价 29.00元

(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)



《闲话三分》首版书影
(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)
书名文字为作者据咫进斋翻宋刻
本《汉隶字源》集字，
各字出处如下：

闲：见《重修周公礼殿记》。汉献帝初平五年（即兴平元年，公元一九四年）立，钟会书。

话：见《张衡碑》。汉顺帝永和四年（即张衡死年，公元一三九年）立，崔瑗撰文，不著书人。

三：见《乙瑛碑》，即《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》。汉桓帝永兴元年（公元一五三年）立，传钟繇书。

分：见《酸枣令刘熊碑》。蔡邕书。唐人王建题此碑诗云：“苍苔满字土埋龟，风雨消磨绝妙辞。不向图经中旧见，无人知是蔡邕碑。”

写在前面

三国故事是人们耳熟能详、津津乐道的。不过人们心目中的三国故事大多来自罗贯中的小说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（通称《三国演义》），而非演义主要依据的史书《三国志》，对于小说与史书之间的关系，大多不甚了了。清朝章学诚认为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实三虚惑乱观者”，指出了其中的虚构性，但作为小说的评语未免苛刻。

陈迩冬先生这本《闲话三分》，将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结合起来评说，亦文亦史，拓展出别开生面的视野。

书中澄清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观念，勾勒出许多历史真相。对刘关张桃园三结义、关云长义释曹操、铜雀春深锁二乔等等脍炙人口的故事，一一循“虚”入“实”，点出小说与史实之

异同，还原历史本来面目，化“腐”为新。同时，对小说的艺术创造也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多层次的分析。指出“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，读者的心赏神会，数百年的流传，这种‘故事新编’已成不朽的名著，其魅人之力，远远超过了其所依据的古史旧志”。由于作者将文与史之间的关系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对于读者理解三国的历史和《三国演义》的艺术成就都颇具启发。

书中文章最初为专栏连载（成书经过详见《再版后记》），篇幅不长，每篇从一条线索写起，看似闲闲写来，却能独辟蹊径，以小见大。舒芜先生评之为“虽是一本小书，而文心史识，意趣笔墨，四美兼具”。作者是文章大家，文字纵横自如，加以见识通达，在短小的随笔中包含着丰富的视点，耐人寻味。虽写故实，偶尔将现代的“流行语”信手拈入文中，遂穿越了历史和当下的世态人情，令读者会心一笑。

陈迺冬先生生于1913年，卒于1990年。年轻时即善诗文、灯谜，有“桂林才子”之称。抗战期间以新诗、小说、小品文等创作走上文坛。解放后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任教，1954年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在古典文学的整理编辑、出版普及上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他不但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，

而且是著名的诗人。一生从写旧诗到写新诗，又转而写旧诗，始终不改诗人本色。著有历史剧《战台湾》、传记《李秀成之死》、短篇小说集《九纹龙》、叙事诗《黑旗》等。他选注的《苏轼诗选》、《苏轼词选》、《韩愈诗选》负有盛名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13年4月

看完《闲话三分》的闲话

顾学颀

迹冬兄《闲话三分》报上连载既毕，将编辑出书，嘱我写序。我平生最怕为人写序，也不会写这类文章。但提到“三分”，不由得引起一点兴趣和儿时情景的追忆。因而不免也闲话一番。不过，很不像一篇正式的序言；塞责过去，也就罢了。

我和古典文学打交道，除了读“经书”之外，最早的一部作品，大概就是《三国志演义》。大约七八岁时，在私塾念书，已读完《孝经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几部经书。每天完成老师规定的读、背、讲、温若干页的正课之后，闲着无聊，起初溜到外院去玩；腻了，很无聊，就带去一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不敢公开看，就放在抽屉里，开一道缝，低着头看。石印本字极小，很费劲，还不时抬起头装作正在读书的神气，怕老师发现了受责备。《演义》是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写成的，我那时的水

平，勉强可以看懂，有的地方也不求甚解，马虎过去。偶尔遇上难识的字或典故及长篇大论，就跳过去不看。有时性急，不知道故事结果如何，某人死了没有，等等，就翻过几页看个究竟。不料有一天老师见我老低着头，不知在干什么，一查看发现了秘密。他倒很开明，说，正课做完了，这种书（意思是正经书，不算坏书）可以放在桌上看。他怀疑我是否能看懂，要我讲一段他听。讲完，很满意。但还要考验一下，指着书上“埋伏”二字要我讲，意思猜的还差不多，但把“埋”误认为“理”，逗得他大笑。说实在的，埋字我还是认识的，只因字小、光线暗、距离远看不清，看书时总把它当作理字马虎看过，以致闹了笑话。后来，他作为笑谈告诉我父亲。二兄仲伊怕我再弄错，换了一部大字的刻印精美、附有图像和读法的给我。好长一段时间，它成了我的“枕中鸿宝”。有时看着了迷，连觉也不睡。记得第一遍看到关羽走麦城，放下书几个月不想再看。五丈原诸葛亮之死，更为他伤心落泪。那时，还有几个比我稍大一点的伙伴，夏天乘凉，聚在一起高谈阔论，提出一些有趣的怪问题，互相质难。有人问：赤壁之战，曹营里到底是多少人马？有人问：全书里有几个人没有下落？有几个骑驴的？徐庶到曹营出过主意没有？吕布、马超、关、张谁的武艺

最强？还有，为什么曹操是奸臣、大家不喜欢？等等。彼此辩论、反驳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几乎打起架来。一次，辩论得最热烈的时候，顾不得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散伙后，一个同学才发现他的被子被人偷走了。于是，这件事成为大人们禁止我们在一起谈《三国演义》的一条正当理由。

之后好些年，外出上学，接触的书多了一些，但功课紧张，只有暑假回家，才是饱看小说的大好时光。家里有一个大园子，树木花草颇盛。我最爱在竹林旁一棵高大的苦楝树旁边，放一张深黄而光滑冰凉的大竹床，床边一个大矮凳、一把茶壶、一堆书，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、杜诗、《文选》和几本新小说，其中自然也有《三国演义》。拿一把蒲扇，躺在竹床上，信手抓起一本，无头无脑地随意看。绿荫蔽日，紫竹摇曳，蝉鸣鹊噪，凉风阵阵，真如陶渊明所说的“羲皇上人”了。困了就睡，醒了喝杯茶，再抓一本什么书，不分卷页，从中看起。有时醒来，忽然发现多了一盘母亲送来的白蜜桃、大梅子，甜酸香脆，饱餐一顿之后，又继续看。这些书，翻来覆去，也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有些片段，当时还能背诵，但很少是从第一页看到末尾的。这时，理解、欣赏能力略比以前高了一点。这种非常有趣的读书方式和环境，是我一生中最难忘记并

经常忆恋的。十年浩劫中，在干校将“奉命退休”时，曾有句云：“此日真堪隐，平生恋晓园。”——晓园，就是上述的我父亲营建的那个园子；而所恋的，主要是那些花花草草，尤其令人忆恋的是那个幽静恬淡的环境和默默的慈爱。——直到大学毕业，在十几架日本飞机盘旋轰鸣之下才离开这个地方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、也根本不可能再见到它了！而《三国演义》，在我脑子里，也逃走得无影无踪了。

也真巧，事隔多年，解放初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不久，文化部调我去工作。没料到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《三国演义》出版。这时才又想起阔别多年的这位“好友”。叫我整理，其实是看校样，在校样上做点修修补补的工作。我接手之前，已有人大笔一挥；在原书上掐头去尾，大删大改，面目全非。我认为这不是办法，坚持恢复毛宗岗本原貌。但版已排好，领导同志叫我适当地恢复较明显、重要的部分，“后人有关诗赞曰”之类的诗已删去就算了。但我仍尽量保持原貌，一些大家的诗也恢复了一些，并作了一点极简单的注释。由于出版部门和工厂催着快印，过期要罚款，来不及详细校订就匆匆问世，这就是解放后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版的经过。

因为我与新版有关，报刊约写文章，评介该书。于是接连

写了长长短短几篇文章；各地也相继登载了讨论此书的论文，出版社还编印过一本研究论文集，算是解放后研究《三国演义》的一次小小高潮。但它的命运，不及《水浒》行时，更比不上红得发紫的《红楼梦》。十年浩劫，戏看八样板，书读一《红楼》，它虽没像《水浒》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但也遭到冷落，“靠边站”了许多年。

“物极必反”，大约还有几分道理。最近几年，《三国演义》继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之后，似乎又有点儿转运了。各地组织学会、研究会，可惜我年老身体不好，未能前往参加，也没有精神再写文章。预料今后《三国演义》的研究工作，必将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和这部小说的因缘，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从七八岁的小孩到七十多岁的老头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。人嘛，饱经忧患；书嘛，历尽沧桑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人和书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——借用陈后山的一句诗：“向老逢辰意有加”。谨在此预祝这部名著的光辉长在！上面写了许多，还不曾谈到本题，现在言归正传，仍然得从幼年看《三国演义》说起。

话说自从老师许可公开看书以后，经过反复阅读谈论，脑子里产生了一些问题；还听人说，故事都是瞎编的、假的，也

有人不同意。一天，在父亲的书橱里，偶然发现一部名叫《三国志》的大书，翻开一看，显然与我看的《三国演义》不同；但曹操、诸葛亮、关羽等人的名字又都在内。便就《演义》中那些疑难在这部书里寻找，求得对证。翻来翻去，有找着的，也有几天也找不出的；还有许多句子看不懂，只得作罢。——可以说，后来我搞古典文学，搞点小考证，兼读一些史籍的兴趣、爱好，除了别的因素以外，《三国演义》作了我的无形的启蒙“向导”。

年龄稍大以后，略知道文和史，历史小说和正史的联系和区别，文艺中的真实和虚构的关系，因而具体想到《三国演义》“七实三虚”的评论。章学诚“七实三虚”的说法对不对呢？如果再从文学技巧、典型塑造来看，作者为什么要虚构？如果再问：哪些是虚中有实，哪些是实中掺虚？如果还问：哪些虚、虚得好，有助于典型形象的丰满？哪些虚、虚得坏，有损于故事情节的完整？还有：陈志和裴松之注的原始材料，作者采用了哪些？摒弃了哪些？张冠李戴挪用了哪些？为什么？还有：历代民间传说资料，戏剧、说话资料，作者又汲取了哪些？另外，一些人物的年龄、性格、行为、社会关系、言谈笑貌等等，有真有假，或增或省，一一又如何？这些，我统统无法回答。

这样看，要答复这些问题，要既懂史又懂文，既搞一点文艺理论，又搞一点小考证；还要亦庄亦谐，且文且白，雅俗共赏，老少咸宜，谈出来人家心里服，写出来人家喜欢看。不能板起面孔搞考证，不能枯燥无味讲理论，更不能游谈无根、油腔滑调，专门玩弄噱头。可见：难矣哉！

正在《三国演义》研究进入新的高潮之际，很有幸，陈迹冬兄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。记得前几年他同我谈过想写三国闲话的事。后来忽然在《光明日报》看见他的大作《闲话三分》连载，又在《团结报》看见他写《三分支话》。“三分”这个词儿，诸葛亮《出师表》已开始用。迨后，唐宋诗人词人都常用。宋元说话人中还有专门“说三分”的。仅看报上的题目：他不用《三国演义》而用“三分”，就知道他的用意和写法，是兼指史实与小说的，是要把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结合起来谈的。果然，一篇又一篇证实了我的看法，一篇又一篇解答了过去存在已久的一些疑问。他用轻松的笔调，闲谈的方式，生动活泼，结构灵便，一篇讲一件事，自成单元，联合成书，又首尾完具，让人看起来有趣味，放下书有想头，深入浅出，亦文亦史，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案头清供。

外行话《三分》

端木蕻良

说起来也真有意思，我第一次看《三国演义》本子，是我的出生地——昌图县衙门排印的。民国成立，我们县来了一位新派县长，他是广东人，把旧式牢监改为新式监狱，由南方买进一台平印机，训练犯人印书，这部《三国演义》就是在这种革新声中产生的。它是连史纸、三号铅字印的大开本，前面有绣像，是位老艺人绘制的。我还曾把它当画本临摹过。

不过，我真正阅读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是汪原放的标点本。更后，才看到毛宗岗本。《三国演义》在我脑海中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但嫌它文字有些半文半白，我阅读的次数就减少了。我自幼就是个白话文派，这便影响我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没有看《红楼梦》和《水浒》那么勤快认真了。可是，有关《三国演义》的论说，我倒是不大放过的。对迺冬写的《闲话三分》，

我更是个热情的读者。

迩冬在写作期间，有四五次病重，住进医院抢救，输氧输液。出院不久，还是续写下去。他对《三国演义》，对《红楼梦》，都可以称为正牌知己。现在，他要我来为这个集子序说几句，他在病中写信来，我也在病中写信去，我俩都不能随意走动，趁着目前还可以笔谈，我想，就该尽量利用。所以，不揣冒昧，写几句外行话，想来读者也会谅解的。

回想抗战期间，我入川时，看到重庆有些人以白巾缠头，这种习气流传下来，据说是为诸葛亮戴孝；在长江上，我还看到过江心的八块巨石，人们指点着说，这就是诸葛亮练兵的“八阵图”。后来我去云南，听到了更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，如用藤编织腰带；有的少数民族驮东西不放在背上，却挂在脖子上等等，都传说是诸葛亮教的。可见诸葛亮的影响，是何等深入人心。对于这些，当然不能低估，但简单说是由于《三国演义》的渲染所致，是不足以说服人的。这里有着历代相传的“口头文学”的功劳在内。“口头文学”和当事人联系是最紧的，和人民的关系也最直接。人们并没有给诸葛亮穿上八卦仙衣，而是把他看成是智慧的化身，说起诸葛亮来，就像谈到一位既熟悉又亲切的老朋友那样。

我对把陈涉年号列入正史，以曹魏年号纪年的史家，都很佩服。因为从历史发展来说，保持刘汉传统，实在没有什么意义。这一点儿也不妨碍我对诸葛亮有特殊好感。从曹操的《蒿里行》等一些诗歌中，就可以看出，汉末社会已经全面崩溃。人们厌弃军阀混战，希望能够再度出现大一统的局面，是当时的普遍社会心理。董卓暴尸街头，人们在他的肚脐上点蜡烛，作为他吸尽民脂民膏的回报，正好说明这一点。当时凡是致力于推翻董卓的人，都被看作是义士，曹操也是这样得到义士的称号的。

那么，聪明绝顶的诸葛亮，为什么在“隆中对”时，就认定“天下三分”是必然趋势呢？而且，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文才武略，偏偏沾到刘备这片西瓜上去呢？

“使君与操”是最有头脑的人物，理该进入当代英雄的行列，这没有错。可是，曹操为人，唯才是用，诸葛亮为什么要舍曹附刘呢？这决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儿。取天下，是要看到力量和前景的，如果明明知道是死胡同，偏要去走，那就不成其为诸葛孔明了。诸葛亮早有分析，而且成竹在胸。

诸葛亮认识到：

一、在大变乱中，人们厌弃军阀混战，相比之下，人心思